

饶学研究

李瑞英题

主 编 林伦伦

副主编 沈启绵 赵松元 陈海忠

第二卷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饶学究

重陽美題

第二卷

主 编 林伦伦

副主编 沈启绵 赵松元 陈海忠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饶学研究. 第二卷/林伦伦主编; 沈启绵, 赵松元, 陈海忠副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5668 - 1564 - 4

I. ①饶… II. ①林…②沈…③赵…④陈… III. ①饶宗颐—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5.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3256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

定 价: 39.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饶学研究》编委会

饶学研究所学术顾问单位：

敦煌研究院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

饶学研究所学术顾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许嘉璐教授

敦煌研究院院长 樊锦诗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 陈平原教授

中山大学历史系 陈春声教授

中山大学中文系 曾宪通教授

暨南大学中文系 詹伯慧教授

暨南大学中文系 饶芑子教授

主 编：林伦伦

副 主 编：沈启绵 赵松元 陈海忠

编 辑：陈 伟 殷学国 周录祥

地 址：中国广东省潮州市韩山师范学院东丽 A 区文科楼饶学研究所

邮政编码：521041

电 话：0768 - 2318529

电子邮箱：raoxue2011@126.com

前言

本书是《饶宗颐研究》改为《饶学研究》后之第二卷，我们的编辑宗旨矢志不移：弘扬饶宗颐教授的学术成果和研究精神，以及由此扩展开来的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

我们要特别感谢各位作者的无私赐稿，这使得《饶学研究》的高质量、高品位能够保持下去。在这卷里，北京大学的李伯谦教授《饶宗颐先生的学术实践对我们的启示》一文，从方法论上谈饶公的治学特色，并揭示饶公治学的最大特色是“创新”二字，极具启发性。贵州大学的王晓卫教授《以正存思，以奇振采——论饶宗颐之俚体序》一文，研究饶公的骈体序言，于其取法六朝，工于说理的特色上尤多发明。

除了饶公的相关研究外，我们还开辟了“华学研究”与“学人研究”两个栏目，从纵、横两个角度延伸饶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汪德迈教授的《中国特有的互关性思想之起源：龟卜技术》，从中西方哲学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的龟卜作了独特的阐释。中国海洋大学李婧博士的《旧学“蜂腰”不可断——论新文化运动中黄侃对旧文学传统的坚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新文化运动中传统派学人的佳例。还有其他作者的文章，也都能立言有据，各见精彩。

今年正逢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我们谨将此卷作为献礼。恭祝饶公海屋添筹、花甲重周，学术之树常青！

编委会

2015年8月5日

目 录

前 言	(001)
-----------	-------

壹 饶宗颐学术研究

饶宗颐先生的学术实践对我们的启示	李伯谦 (003)
“游于方内，而寄情无始”——选堂面向实相的精神取向	孙爱玲 (010)
选堂先生与秦汉时制研究	曾宪通 (018)
饶宗颐教授与粤东考古	邱立诚 (024)
饶宗颐先生对潮汕历史文献的发掘与研究	周少川 (031)
饶宗颐《潮州志》的编纂特色	黄继澍 (044)
以正存思，以奇振采——论饶宗颐之骀体序	王晓卫 (056)
饶宗颐与中国现代词学之姜夔词研究	王奎光 (065)
也谈岳飞《满江红》词真伪的研究成果——略述饶宗颐先生 《贺兰山与满江红》兼与王曾瑜、郭光两先生商榷	陈 伟 (089)
选堂登游诗研究	吴声琮 (095)
文化史视野下的主体创作心理机制研究——以饶宗颐的黄公望 研究为探讨中心	郭景华 (109)
论饶宗颐先生“奇古”书法风格的形成	林旭升 (120)
饶宗颐先生与二十世纪楚辞学	陈民镇 (139)



贰 饶宗颐印象

王气既苏：记饶宗颐先生

胡晓明（171）

大师与古桥——饶宗颐教授与广济桥的因缘

沈启绵（174）

叁 华学研究

中国特有的互关性思想之起源：龟卜技术

汪德迈（185）

鄯善出土《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题记考

许云和（188）

扬雄《蜀都赋》未入《文选》探赜

邵小龙（193）

祝允明《祝子志怪录》真伪考辨

陈国军（203）

肆 学人研究

异代何妨结相知：吕碧城与楚骚传统

杨 焘（215）

旧学“蜂腰”不可断——论新文化运动中黄侃对旧文学

传统的坚守

李 婧（229）

别有奇芬日采撷：抗战初期的詹安泰先生日常生活研究

陈嘉顺 黄晓丹（237）

论王元化的人文之思

何书岚（257）

壹

饶宗颐学术研究

饶宗颐先生的学术实践对我们的启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李伯谦^①

饶宗颐先生是当代中国学术的旗帜，是无人可与之比肩的真正的学术大师。这一评价不是我说的，是同样被称为大师的季羨林先生说的。2002年，季先生让我就聘请饶先生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一事起草致北京大学校长暨学术委员会的报告时对我说：“现在大师满天飞，我不是大师，饶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师。”

季先生称饶先生为真正的大师，并非人云亦云或溢美之词，而是在阅读并研究过饶先生的大部分著作之后作出的论断。1984年，季羨林先生在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所写序中说：“几年以前，饶先生把自己的大著《选堂集林·史林》三巨册寄给了我。我仔细阅读了其中的文章，学到了很多。在国内同行中，我也许是读饶先生的学术论著比较多的。”序文中，季先生在简要介绍饶先生学术生平后，根据饶先生自己的归纳，将其学术研究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书画八个门类，一一列举出各门类的代表性论著。季先生说道：“从上面这个著作表中可以看出，饶宗颐教授的学术研究涉及范围很广，真可以说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然后季先生从世界各国学术发展史的高度，根据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诸位大师对中国学术发展史规律的总结，特别是援引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学术的评介，认为陈寅恪先生所列举的王国维遗书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的三目，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都可以应用到饶先生身上，并分别以“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三节，另加《饶宗颐

^① 作者简介：李伯谦，1937年生，男，河南郑州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李伯谦谈中国青铜文化》、《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商文化论集》等。

史学论著选》中未归入此三目的中国史、高僧传记、人物、地志、《太平经》、《说郛》和《梦溪笔谈》七类，详细分析并总结了饶先生的学术成就。季先生说：“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转变时期，一个空前的大繁荣时期。处在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学者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投身于其中。有的学者仍然像过去一样对新时代的特点视而不见，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结果是建树甚微。而有的学者则能利用新资料，探讨新问题，结果是创获甚多。”我认为饶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站在时代学术潮流前沿的学者。季先生又引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借用佛教“预流”一词形容“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的话，认为“陈先生借用的佛教名词‘预流’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名词。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王静安先生是得到预流果的，陈援庵先生是得到预流果的，陈寅恪先生也是得到预流果的，近代许多中国学者都得到了预流果。从饶宗颐先生的全部学术论著来看，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也是得到了预流果”。用通俗的话说，在近百年中国学术发展史上，饶宗颐先生和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一样，也是站在学术发展潮流前沿的一位大师，是既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于一身，又擅长书法、绘画，在我国以及英、法、日、美等国家享有极高声誉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伟大学者。

饶宗颐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人人景仰的学术大师，绝非偶然。我认为，这里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他本人的努力。饶先生出生于潮安首富之家、书香门第，从小不愁吃穿，也不愁没有书读或没有老师教，甚至不愁没有古玩去玩赏，客观条件非常优越。但再好的家境也不见得能造就人才，正如饶先生在《饶宗颐学述》中所言，这样的家境，“按理说，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出来”。但事实上，饶先生没有成为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却成了一个学人，一代学术大师，这显然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从饶先生的学术经历来看，以下几项无疑是他成为学术大师的重要原因：

(1) 自幼在父亲、伯父等长辈的熏陶下，博览群书，习字作画，熟读先秦典籍，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饶先生说：“我小时候，只是成天沉浸在书籍古画之中，几乎可以一个人一整天待在书楼画室里。”儒家经典、清儒著作、道家著作、武侠神怪小说、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胡适乃至卡尔·马克思、罗曼·罗兰的书他都有所涉猎。他说：“我20岁以前读书确实很广泛。记得当时香港有一个书局叫新垦书局，这个书局出来的新书，我都整个读完了。”

(2) 饶先生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而是读有所思、思有所疑、疑有所写，他七八岁起就开始写东西，形成了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创新的风格。据《饶宗

颐学述》，他七八岁时，看过《封神榜》后就写了《后封神》，20岁前，既写骈文，又写新、旧体诗，撰成《郭之奇年谱》，试作《顾炎武学案》，续修《潮州艺文志》，作《广东潮州旧志考》、《楚辞地理考》、《海阳山辨》、《恶溪考》、《韩山名称辨异》等文章；20岁后，涉猎范围进一步扩大，甲骨文、帛书、文学、哲学、诗词、绘画等，无所不包，论文一篇接着一篇，专著一部跟着一部，篇篇有己见，部部有新说。

(3) 既重文献，又重野外调查和考古。1938年，饶先生21岁，深入民间调查畚族。1948年，他31岁，在汕头主持纂修《潮州志》期间，亲赴揭阳、潮安、普宁、兴宁、饶平、丰顺等地进行考古考察，完成《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初稿，并于1950年在香港出版。1951年，又撰成《海南岛之石器》，由香港国泰印刷所印行。饶先生后来虽定居香港，但仍一直将家乡考古事业的进展放在心上。1999年，北京大学成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共推饶先生为学术顾问之一。2000年3月，举行聘请饶先生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和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顾问仪式，请饶先生作《殷代地理疑义举例——古史地域的一些问题和初步诠释》学术报告，座谈时，饶先生提出，希望该研究中心在粤东揭阳、潮州、汕头一带做试点工作，把榕江流域的古代文化梳理一下。饶先生还说，那儿是他的家乡，他和当地的领导也比较熟悉，可以请他们支持一下。于是，经我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博物馆、揭阳博物馆、中山大学历史系、人类学系进行沟通，研究中心在2002年酝酿提出了“古揭阳（榕江）先秦两汉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课题，组成了以饶先生为顾问的课题组，课题组由我任组长，曾骐、邱立诚任副组长，成员有徐天进、李海荣、徐坚、金志伟、魏峻、林戊源等。下面成立了揭阳考古队，从2003年至2005年，在饶先生的指导和揭阳市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考古队在对揭阳市博物馆和市属各市、县博物馆或文管会的收藏文物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普宁虎头埔、揭东面头岭和宝山崇遗址进行发掘，在揭阳市和揭东、揭西作了调查，先后完成了《揭阳的远古与文明——榕江先秦两汉考古图谱》和《揭阳考古（2003—2005）》两部著作，基本勾画出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粤东古文化发展的脉络，受到饶先生的肯定。2006年，我主要依据课题组的成果撰成《粤东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观察》一文，同年12月13日在香港召开的“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发言。按照课题计划，需要继续在潮州、汕头开展工作，我和课题组成员——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邱立诚、中山大学教授曾骐专程赴潮州进行联系，市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接见了我们，答应尽快研究落实，后来在饶先生提议下，潮州“饶宗颐学术馆”还专门成立了“粤东考古研究中心”负

责此项事宜，但至今七年过去了，一直未能继续实施，每念及此，对饶先生总有歉疚之感，总觉得未能完成饶先生交代的任务。

饶先生重视考古发现，季羨林先生对此深有感触。季先生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中写道：“他非常重视国内的考古发掘工作。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加以探讨研究，以之与纸上遗文相印证。他对国内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习，简直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即使参观博物馆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时时注意对自己的学术探讨有用的东西。地下发掘出来的死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往往变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再加上他对国外的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挥若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国内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术刊物，往往为人们所忽略，而饶先生则无不注意。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4) 重视域外学术交流，不断获取学术信息。饶先生 30 岁后，除中国大陆各省、市外，还先后赴中国香港、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瑞士、意大利、黎巴嫩、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美国、印度尼西亚、西班牙、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学术会议、考察、执教、讲学。既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成果及时介绍到国际学术界，同时也不断撷取吸收国际同行的信息，随时掌握国际学术动态，丰富自己的研究，回答新提出的学术问题，永葆学术青春，屹立于国际学术潮流发展前沿。以甲骨文研究为例，饶先生不仅熟习国内各家所藏，还乘出外考察之便，参观了日本、法国、英国等国研究机构的收藏品，出版了《日本所见甲骨录》、《巴黎所见甲骨录》、《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甲骨文通检》等著作。

饶先生的学术研究具有涉及人文领域各个学科、地跨国内外的特点，丰富的经历使得他很早就成为华人中少有的国际学者。除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任教外，饶先生还于 1954—1955 年在日本京都大学研究、讲授甲骨文，1956 年赴巴黎出席第九届国际汉学会议，1957 年赴德国马堡出席第十届国际汉学会议，1962 年获法国法兰西学院以法国 19 世纪著名汉学家儒莲命名的汉学儒莲奖，1967 年赴美国纽约出席“楚帛书及古代中国美术与太平洋地区关系可能性学术研讨会”，1968 年出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首位讲座教授兼系主任，1970 年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1972 年任法国远东研究院院士，1974 年赴日本出席在江户大学召开的“东南亚考古学术研讨会”，1976 年赴法国讲学，1978 年应聘为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学部客座教授，1980 年赴巴黎接受亚洲学会荣誉会员荣衔，1981 年受聘为澳门东亚文学院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客座教授，1982 年赴美国夏威夷出席“商代文明国际研讨会”，

1983年赴日本出席“第三十一届国际亚洲北美人文科学会议”，1984—1985年在马来西亚举办个人画展，1985年在韩国汉城举办“选堂韩国书画展览”，1986年赴法国出席巴黎大学宗教研究院成立百年纪念之“社学会议”，1990年赴美国于哈佛大学东亚系作演讲，1992年赴越南出席“法国远东学院成立9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1993年赴巴黎接受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授予的人文科学博士学位和法国文化部授予的艺术勋章，被聘为泰国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1997年其《文化之旅》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赴巴黎出席远东学院100周年纪念盛典……饶宗颐的名字，在国内外学术界无人不晓；饶宗颐的著作和书法作品，在国内外学术界乃至艺术界几乎没有人没有读过、欣赏过。

(5) 注重研究方法，敢于推陈出新。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首先提出以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证的二重证据法，现已广为学术界所用。1982年5月，饶先生在香港召开的夏文化讨论会上致辞，又提出三重证据法（见2003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所收录的《谈三重证据法——十干与立主》），将甲骨文单独提出来作为第三种证据。根据我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理解和饶宗颐先生的研究实践，我认为所谓三重证据法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纸上之遗文即现存古籍文献；二是地下出土之古代文字资料，甲骨文、金文、简帛、陶文、刻符等都包括其中；三是从地下出土的没有文字的古代遗迹和遗物。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看重的是纸上遗文即文献与地下出土文字资料的互证，而较少注意地下出土的没有文字的东西；饶先生的三重证据法，既有文献和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也有相当多地下出土的不含文字的遗迹、遗物之间的互证。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沈建华女士编辑的《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较全面地展现了饶先生在出版《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后运用三重证据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敢于推陈出新，指的是饶先生对自己以往的研究结论敢于用新的研究成果加以修正甚至否定，也敢于以新的研究成果对别人包括自己崇敬的学术大师的权威论断提出挑战。

关于饶先生敢于否定自己原有的研究成果，北京师范大学周少川教授在《饶宗颐教授学术成就管窥》（见2005年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出版的由卢瑞华编辑的《走近饶宗颐》一书）一文中举出两个例子：一是饶先生早年曾撰《新史》，“以王莽入本纪，述新莽一朝史事”，这是把王莽当作皇帝来写的；后饶先生研读《通鉴》，觉得不合传统中国正统史观，遂否定原来主张，未按原貌出版。二是饶先生曾应顾颉刚之约撰《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并

在《责善》半月刊一卷三期上刊出了目录，“后因不断自省，遂意识到《古史辨》有些地方是比较草率的，特别是辨伪的方法不成熟，假定太快，而新的考古发现，往往说明古时记载的可靠和某些辨伪是不正确的，因此他果断放弃了对《古史辨》第八册的编辑”。

关于饶先生敢于以新的研究成果对权威论断提出挑战，周少川教授在《饶宗颐教授学术成就管窥》中举出了饶宗颐先生和陈寅恪先生在梵文对中国文学、音韵影响上的不同看法。陈寅恪是通晓梵文和多国文字的大师，又是饶先生的前辈，他在《四声三问》一文中认为中国音韵中的平、上、去、入四声来源于印度吠陀三声。但饶先生撰《印度波你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四声外来说评议》一文，提出异议，指出“吠陀的抑音、扬音、混合音三种诵法在公元前2世纪已经失传，不可能在南齐时影响中国的声调”，这显然是正确的。

饶先生敢于推陈出新，是缘于他对问题有深刻的研究和真知灼见，是缘于他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为什么的钻研精神。饶先生的这种精神和勇气，在他20多岁著《楚辞地理考》时同钱穆教授讨论屈原放逐地，30岁主持《潮州志》编纂时对海阳县方位、义安置郡年期的考证中已明显表露，在之后的研究中更比比皆是。

以上五个方面，只是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和看法，挂一漏万，肯定是不全面的。但尽管如此，饶先生对我们这些想做学问的后来者来说，已有以下多方面的启迪：

第一，是要打好国学基础。以文、史、哲为核心内容的国学，是几千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今天的文化，是昨天文化的发展；昨天的文化，是前天文化的发展。只有真正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前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的一些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学文科的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很少读经典原著。写文章时引古人、古书上的话常常是转引来转引去，不查原文，不求甚解。若这种状况不加改变，基础必定打不牢、打不好，很难有大的起色。

第二，是要了解学术史。我们提倡读书，但反对读死书、死读书。只有掌握了学科的发展史、熟习所要研究的问题的来龙去脉，才能了解这个学科当前的状况和水平，了解所要研究的问题的最新进展，找出症结所在和可能解决的途径。读死书、死读书，可能满脑子都装着知识，但这些知识是孤立的、不连贯的，若不能从中找出规律、发现问题，当然也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三，是既要读，又要写。读是累积知识、发现与思考问题的过程，写是整理思绪、解决问题的过程。读和写联系起来，对于解决具体学术问题来说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有的人，书读了很多，谈起来好像头头是道，但就是懒于动笔，不写东西。一篇论文，一部著作，是研究成果的结晶，是要给别人看的，是要交给社会评判的，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通过著作这种形式体现出来的。饶先生之所以成为学界公认的大师，难道不是因为他“等身”的著作和著作中精彩的论断为大家所熟知、所肯定吗？

第四，是要力戒封闭，广泛交流。过去，有的读书人喜欢自己关起门来读书，不和人来往。学问学问，既学又问，问老师、问同学、问朋友，问就是交流。交流才能传递信息，交流才能互相启发、互相促进。现在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比过去好多了，国内的、国际的各种学术讨论会比比皆是。只要有研究文章，便可带到会上去交流，在会上就能听到对所研究问题的各种观点、研究方法，甚至新的资料，由此研究成果才能在这样的平台上得以展示。通过这种广泛交流，我们能够受到启发，不断提高，增长才干。饶先生从年轻时到现在，可以说是不停地跑，跑国内，跑国外，参加过数不清的考察活动，出席过数不清的学术会议和讲座。通过这些活动，他把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传达给社会，也获得了新的启示和社会的认可。

第五，牢记三重证据法，不断扩展研究渠道，不断推出创新成果。三重证据法是长期研究实践在方法论上的总结，它既增加了证据来源的多样性，也保证了论证过程的严密性，从而也就使得作出的论断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和更多的可信性。而这样的研究成果，就像饶先生的许多论文那样，往往是发别人所未发，具有创新的意义。

饶宗颐先生的学术实践和研究成果，对我们的启迪是多方面的，但归结到一点就是“创新”两个字。季羨林先生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中，谈到饶先生的著作对我们的启发时，着重强调两点：一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会落伍，就会僵化，就会停滞，就会倒退”；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就能前进，就能创新，就能生动活泼，就能逸兴遄飞”。二是“掌握材料，越多越好。材料越多，在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方法的指导下，从中抽绎出来的结论便越可靠，越接近真理”。

季先生说，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再也不能因循守旧，只抓住旧典籍、旧材料不放。我们必须扫除积习，开阔视野，随时掌握新材料，随时吸收新观点，放眼世界，胸怀全球；前进，前进，再前进；创新，创新，再创新”。这是季先生读《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和其他著作的主要感想，也是发自内心要求我们向饶宗颐先生学习的最诚挚的嘱托。



“游于方内，而寄情无始”

——选堂面向实相的精神取向

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孙爱玲^①

人类生活由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性（魂）生活构成。物质生活为世间实践，灵性生活为出世间实践（生命归宿），精神生活则是二者的联系纽带，它们均是人类生命的本有之义。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对人类生活多重内涵的体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唐宋以来，以至明清时期的三教合一思想将中国士人对人类生命多重内涵的体认推向一个深邃的境界，人们在回归中华文明源头“道”的思考过程之中，楔入了对佛教所示生命实相的体认，从而弥补了儒、道两家的思想缺陷，形成了中国士人“向上一路”的精神取向。

这种精神取向滋养了中国文人的生命实践，如王维、白居易、苏东坡、汤显祖、袁宏道等人，他们以佛教般若妙智慧为导引，超越了世俗境界，丰富了生命实践，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中西文化碰撞，文化精英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见佛教实相以及般若妙智慧的价值，以之变革社会现实，他们的人生实践超越了形上形下、唯心唯物、宗教科学、此岸彼岸的思辨葛绊，直面实相，直达生命本源，给人以深刻启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选堂先生吸取传统文化精华，深刻体悟佛教揭示的宇宙人生实相，以般若妙智慧为导引，“游于方内，而寄情无始”^②，形成面向实相的精神取向，指出生命实践的“向上一路”，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拓展作出了贡献。本文就选堂生命实践的精神取向作些粗浅探讨，或可为人们生命实践提供某种参考。

^① 作者简介：孙爱玲，1958年生，女，内蒙古包头人。文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② 语出饶宗颐：《佛国集“三巡海峽”小序》，载饶宗颐：《饶宗颐东方学论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